

政治·外交

文明交流互鉴与中国—南亚东南亚命运共同体构建

何祖坤 林延明

摘要：中国与南亚东南亚的文明交流互鉴，是彼此友好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绵延至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在不同历史时期呈现出不同的阶段性特征。丝绸之路开辟后，古代中国文明与南亚文明、东南亚文明之间的交流互动日益增多，形成了丝路相通、亲近友好的历史面貌。近现代时期，中国与南亚东南亚的前途和命运休戚相关，使得彼此之间的文明交流互鉴打上了患难与共的历史烙印。在当代，中国与南亚东南亚各国虽然存在现实国情和发展道路的差异，但彼此之间的文明交流互鉴历久弥新，体现出命运相连、求同存异的历史大势。总体上看，中国与南亚东南亚的文明交流互鉴具有源远流长、历久弥新，官民并举、民间先行、取长补短、择善而从等鲜明的历史特点。从文明交流互鉴的历史启示来看，推动构建中国—南亚东南亚命运共同体，文缘相融是先天优势，文化认同是关键所在，文明对话是必由之路。因此，要大力弘扬丝路精神，深刻阐释构建中国—南亚东南亚命运共同体的精神内涵。要大力挖掘历史资源，充分调动构建中国—南亚东南亚命运共同体的文化基因。要大力开展人文交流，不断夯实构建中国—南亚东南亚命运共同体的人文基础。要大力推动南方丝绸之路联合申遗，积极推进构建中国—南亚东南亚命运共同体的项目合作。

关键词：中国；南亚；东南亚；文明交流互鉴；命运共同体

收稿日期：2020-03-12

作者简介：何祖坤（1965~），云南省社会科学院、中国（昆明）南亚东南亚研究院院长、研究员，云南省印度洋研究会会长，主要研究领域：公共管理、周边治理及印度洋问题等；林延明（1984~），历史学博士，云南省社会科学院、中国（昆明）南亚东南亚研究院南亚研究所副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南亚史、印度边疆史等。

基金项目：本文系金砖国家智库合作中方理事会2020年度对外委托课题和云南省印度洋研究会2019年度重大项目“中国与环印度洋地区合作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文明交流互鉴指的是世界上不同文明之间进行交流、相互借鉴的活动过程。

习近平主席指出，“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文明交流互鉴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人文基础，是增进各国人民友谊的桥梁，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①中国与南亚东南亚地缘相近、人缘相亲、商缘相通、文缘相融，彼此之间文明交流互鉴绵延两千多年从未中断，历久弥新，不仅是中国与周边友好关系史的重要内容，而且也是世界历史上多样文明相互尊重、共存发展的典型范例，具有深厚的历史底蕴、丰富的人文内涵、鲜明的地域特点，对今天推动构建中国—南亚东南亚命运共同体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本文拟结合对中国与南亚东南亚文明交流互鉴历史脉络的梳理，从增进文明交流互鉴的视角，就如何推动构建中国与南亚东南亚命运共同体这一重大时代课题，提出若干思考。

一、中国与南亚东南亚文明交流互鉴的历史演进

中国与南亚东南亚的文明交流互鉴历史悠久，绵延至今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内涵极其丰富，且在不同历史时期呈现出不同阶段性特征。

（一）古代：丝路相通、亲近友好

中国与南亚东南亚地缘相近，不同文明之间交流互鉴的历史源远流长。有充分证据表明，至迟到了公元1~2世纪丝绸之路开辟后，古代中国文明与南亚文明、东南亚文明之间的交流互动日益增多，交流互鉴的程度也不断加深，形成了丝路相通、亲近友好的历史面貌。

广义上讲，丝绸之路是古代东西方政治经济文化往来通道的统称，可分为北方丝绸之路、南方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与草原丝绸之路等。其中，北方丝绸之路、南方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是中国与南亚东南亚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通道。

首先，北方丝绸之路的开辟打通了中国与南亚官方直接交往的重要陆路通道。《史记》记载，张骞受汉武帝之命两次出使西域，第一次出使曾到达大宛、康居、大月氏和大夏等国，第二次出使到达乌孙后返回，但在回国前又派副使分别出使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身毒、于田等国。其中，大夏在今阿富汗阿姆河一带，身毒就是印度。可见，张骞通西域打通了“隔绝东西方的最后一道壁垒”，开辟了连结中国与印度西北部地区的“西域道”，自此北方丝绸之路“像一条纽带”，“把中国同西方世界紧密地连接起来”，使得中国文明与南

^① 习近平：《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求是网，2019年5月1日，http://www.qstheory.cn/dukan/qs/2019-05/01/c_1124440781.htm。

亚文明有了直接的联系和交往。^①

其次，南方丝绸之路的开通增进了中国与南亚东南亚的民间交往。张骞通西域归来后，向汉武帝详细禀报了西域风土人情状况，称在大夏看到了“邛竹杖”和“蜀布”，并且得知是由大夏的商人到“身毒国”买回来的。由于邛竹杖和蜀布为汉朝时期蜀地（今四川盆地）的物产，张骞据此推定，由蜀西南取道身毒可通大夏。当然，蜀地距离大夏路途遥远，在当时的条件下，“邛竹杖”和“蜀布”这样的物产直接从蜀西南取道身毒，走陆路销往大夏，或不太可能。这一点也早有学者提出质疑，并认为“邛竹杖和蜀布是经由当时的巴蜀、夜郎和南越再由海路进入印度的”。^②

张骞归国后，还向汉武帝进言称，“大夏在汉西南，慕中国，患匈奴隔其道，诚通蜀，身毒道便近，有利无害”。汉武帝接纳了张骞的建议，决心在秦朝“五尺道”的基础上，“对西南夷的道路进行大规模的开发和修建”^③，将早在秦统一前就已开凿的“西南夷道”贯通至滇西洱海地区。永平二年（公元69年），东汉明帝在今云南保山地区设立永昌郡，将西夷道、南夷道和永昌道连成一线，打通了直至身毒、大夏“国际通道”的国内段。至此，一条起自四川成都，经云南大理、保山、德宏进入缅甸、泰国，再通往印度，及至中亚、地中海沿岸的南方丝绸之路得以全线贯通。^④当然，由于沿途多原始森林、深山峡谷，路况十分艰险，加之诸多关隘又被不同势力所掌控，旅途安全也较为堪忧，因此南方丝绸之路一开始所承载的商贸活动和人员往来并不算多，其连通中国与南亚东南亚，尤其是川滇缅印毗邻地区的功能作用，直至唐朝以后才随着各方交流的增多而逐渐得以发挥并为世人所关注。

最后，海上丝绸之路的形成丰富了中国与南亚东南亚文明交流互鉴的内涵。海上丝绸之路也称“海上陶瓷之路”和“海上香料之路”，是从中国沿海地区出发，经东南亚、南亚，抵达非洲东海岸及红海、波斯湾、地中海沿岸的一条远洋贸易航线，在古代历史上大体经历了萌芽于先秦、形成于秦汉、发展于魏晋、兴盛于唐宋、衰落于明清的兴衰变迁。作为东西方之间已知最古老的海上航线，海上丝绸之路将古代中国与南亚、东南亚乃至世界上其他地区的主要文明古国和

① 崔连仲、武文著：《古代印度文明与中国》，岳麓书社2007年版，第229页。

② 吕昭义：《对西汉时中印交通的一点看法》，《南亚研究》，1984年第2期，第58页。

③ 罗亭：《论汉武帝时期对西南夷道路的开发》，《河南科技学院学报》，2012年第5期，第36页。

④ 南方丝绸之路又称“西南丝绸之路”“蜀身毒道”“川滇缅印通道”等，是一条“连接中国西南与印度的通道”，其开辟时间虽然在学术界尚存争议，但大多数学者倾向于认为，“至迟到公元前4世纪末”，这条“中印间最早开辟的通道”以及“古代中国边民经缅甸赴印度的最短行程”，便已经开通。参见周智生：《中国云南与印度古代交流史述略（上）》，《南亚研究》，2002年第1期，第55-56页。

文化发源地连接在一起，推动了这些地区之间的经贸往来和文化交流。

《汉书·地理志》记载，汉武帝时期，自日南障塞（今越南中部）、徐闻（今广东徐闻）、合浦（今广西合浦）三地乘船出海，先后途径都元国（今印尼苏门答腊岛西北部）^①、邑卢没国（今缅甸勃固附近）、谶离国（今缅甸伊洛瓦底江沿岸）、夫甘都卢国（今缅甸卑谬附近），历时一年左右可至黄支国（即古印度建志补罗，今印度南部金奈附近的康契普腊姆），黄支国以南，有已程不国（今斯里兰卡），汉朝翻译使者从这里返程，期间自黄支国起航，船行8个月后抵达皮宗（今新加坡西面的皮散岛）^②，再船行两个月后从日南、象林县边境登陆回国。通过这条航线，西汉王朝派出使者，携带黄金、杂缯（丝织品）等货物，与南亚东南亚各古国进行贸易，带回来明珠（珍珠）、璧流离（琉璃）、奇石等异物，黄支国还曾在王莽辅政时期“遣使献生犀牛”，引起一时轰动。

唐中期以后，由于唐朝政府失去了对西域的控制权，陆上丝绸之路一度中断。随着中国经济重心逐渐南移，海上丝绸之路获得了兴盛发展的契机，“终于取代陆上丝绸之路，成为中国对外交往的主要通道”。^③此时，一条史称“广州通海夷道”的远洋航路已经开通，从我国东南沿海出发行至东南亚后，经印度洋北部、红海沿岸以及非洲东北部，最远可抵达波斯湾地区，全程超过1万公里，但航程仅需历时约3个月，将中国出产的丝绸、瓷器、铜铁器等运销海外，同时运回了沿途港市盛产的象牙、犀角、乳香、没药、珍珠、宝石、珊瑚等各类物产。中国学者肖宪评价称，“这条印度洋航线把中国和当时世界上的另外三大地区——以室利佛逝（印尼苏门答腊）为首的东南亚地区、以天竺（今印度）为首的南亚地区和以大食^④为首的西亚地区，通过海外贸易连接在一起”，“不仅促进了中国与这三个地区大量的货物贸易，也推动了中国与这些地区的人员往来”。^⑤

可以说，上述几条丝绸之路的开辟与发展本身就是中国与南亚东南亚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内容。进一步而言，依托丝绸之路的连接纽带作用，古代中国与南亚东南亚文明交流互鉴的内容不断丰富、互动日益频繁，不仅有物质文明领域

① 关于都元国之故址，学界尚无定论，有学者认为在今印尼苏门答腊岛西北部，也有学者以为在今马来西亚西部。

② 关于皮宗之故址，学界有数说，有学者认为在今新加坡西面的皮散岛，另有学者认为在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东部宽但河口的皮散岛，还有学者认为在今苏门答腊岛北部，少数学者认为在今泰国克拉地峡的帕克强河口。

③ 肖宪：《古代从海上丝绸之路来华的西亚人》，《群言》，2019年第12期，第41页。

④ 大食即今阿拉伯地区。

⑤ 肖宪：《古代从海上丝绸之路来华的西亚人》，《群言》，2019年第12期，第42页。

的互通有无，更有精神文明领域的互学互鉴。其中，以佛教为代表的宗教文化传播，促成了两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期古代中国文明、南亚文明和东南亚文明交流互鉴高潮的出现，而多位中国高僧游历南亚东南亚成为这一时期三大文明交流互鉴的见证者。

在西行求法的诸多高僧中，玄奘取经的故事直至今今天仍为人津津乐道。公元629年至645年，玄奘历时17年之久，跋涉5万余里，游历了100多国。回国之后，玄奘本人口述、弟子辩机记录整理而撰成了《大唐西域记》，详述西域138国的历史地理、民族宗教、社会文化等方面的情况，生动反映了古代中华文明与印度文明交流互鉴的历史面貌。值得注意的是，唐代以前，南亚次大陆是“随地称国”，至玄奘周游五天竺之后才“语其所美，谓之印度”。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玄奘西行印度可谓是人类文明交流互鉴史上的一座难以逾越的丰碑。我国著名学者季羨林先生评价玄奘称，“他是唐代著名的高僧，佛教唯心主义理论家，不畏艰险的旅行者，卓越的翻译大师，舍身求法的典型，中印友好的化身”。^①印度历史学家阿里（Ali）则指出，“如果没有玄奘，重建印度史几乎是不可能的”。^②

唐代中后期，在印度佛教开始走向衰落的同时，中国却日益成为世界的佛学中心。在此过程中，中国文化明显受到了这一发源于古印度的外来宗教文化的影响。例如，在天文历算方面，中国的取经僧和印度的来华僧将古印度关于二十七宿、七曜、十二宫、星占、笔算等方面的知识传播到中国，使得中国的计时法、日影测量法、季节划分法等均有了进一步发展，唐代翟昙罗制定的《光宅历》和僧一行所造的《大衍历》明显受到古印度天文历算的影响。在实用技术方面，印度古代压榨甘蔗汁制糖的信息早在两晋南北朝时代就通过佛经介绍传入了中国，唐初时太宗皇帝派人赴印学习熬糖法，进一步提高了中国甘蔗制糖技术。此后，中国的制糖技术日渐成熟，又回传至印度，是为古代中国与印度两大文明双向互动的典型例证。在文学方面，佛经故事、佛教人物等不断进入中国文学作品，对唐代传奇小说的兴起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更加重要的是，随着佛教的广泛传播，新的文学体裁——变文——开始出现，这种在俗讲基础上形成的韵散相间的文体形式深刻影响到了后世的讲唱文学。在建筑艺术方面，唐代以后，藏传佛教寺院在设计、布局等方面受到印度、尼泊尔等地佛寺建筑风格的显著影响，例如

^① 玄奘、辩机著，季羨林等校注：《大唐西域记校注》（上），中华书局2000年版（2008年重印），《玄奘与〈大唐西域记〉——校注〈大唐西域记〉前言》，第1页。

^② 《佛教电影：〈玄奘大师〉》，腾讯网，2018年9月7日，<https://new.qq.com/omn/20180907/20180907A1XB0B.html>。

西藏著名的大昭寺就体现了中国西藏、印度、尼泊尔等佛寺风格的融合，桑耶寺则是由古印度莲花大师亲自勘察、古印度著名佛学家寂护亲自设计的。概以言之，正如中国学者薛克翘所说，“在经过长期痛苦的文化整合以后，佛教文化已经成为中国文化的一个有机部分而深入人心，从而在人生观念、思维方式、道德标准、价值取向、生活习俗等各个方面发挥着无形的作用。”^①

除了物质与精神文明的许多领域中丰富的交流互动之外，人口的迁徙流动同样也是古代中国与南亚东南亚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内容，而丝绸之路除了是商贸流通的通道之外，还是民族迁徙的走廊和人员往来的路线。唐代之后，东南亚的“唐人”日益增多，他们都是远航经商过程中出于各种考虑留居海外的中国人，并且得到了当地人的优待。爪哇的史籍中就有此类记载，说唐朝同光六年（公元924年），来自中国的一艘大沙船“在爪哇之三宝瓏附近沉没，船客漂流至岸”，船上的管事“献宝物于武葛王（Tegal）”后，得到允许“召集余众，定其居，受优良之待遇。”^②公元13世纪，生活在今云南德宏的一支傣族，在首领昭龙·苏卡法的率领下离开世居地，开始辗转向外迁徙，进入今印度东北地区，最终在1228年建立了历时六百余年的阿洪姆王国，古代中国文明的因素尤其是傣族文化随之传播至印度次大陆。15世纪，明朝三宝太监郑和七下西洋，中国与南亚东南亚的文明交流互鉴迎来了新的浪潮。所谓“西洋”，根据学者研究，明朝人所指的是“那没黎洋”，也就是今天的印度洋海域，而郑和七下西洋则将古代中国与东南亚、南亚，乃至东北亚、中亚、西亚以及东非、欧洲等地，“连成了一个文明互动的共同体”^③，体现出“政治上国家权力整体上扬，经济上贸易资源互通有无，文化上多元文化认同交融”的重要特征，“开创了印度洋区域各国跨文明对话与合作发展的新局面和国际新秩序”。^④

回顾中国与南亚东南亚文明交流互鉴的历史，古代中国与南亚东南亚各国虽然也曾发生过摩擦、冲突乃至战争，但长期持续、领域广阔、内容丰富的和平交往才是彼此关系的主流。并且，在长期友好交往的过程中，中国与南亚东南亚各族人民不仅开辟了以南方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为代表的多条多向的往来通道，而且创造了中华文明、南亚文明和东南亚文明兼容并包、交流互鉴的光辉历史，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

① 薛克翘：《中印文化交流史》，昆仑出版社2007年版，第179页。

② 陆芸：《中国与东南亚关系的历史回顾与展望》，耿昇等主编：《多元视野中的中外关系史研究——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第六届会员代表大会论文集》，延边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1页。

③ 万明：《全球史视野下的郑和下西洋》，《中国史研究动态》，2019年第2期，第46页。

④ 同上，第48~49页。

（二）近现代：休戚相关、患难与共

近代以后，由于殖民主义的侵略和扩张，中国与南亚东南亚各国都曾沦为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各自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被打断，彼此之间的正常交往也遭到外来因素的严重干扰。应该说，遭受殖民主义侵略压迫的苦难史和屈辱史，以及反抗殖民主义的斗争史和谋求民族解放的探索史，既是中国与南亚东南亚各国的共同历史记忆，也是中国与南亚东南亚在近现代进行文明交流互鉴的客观历史条件。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中国与南亚东南亚的前途和命运休戚相关，使得彼此之间的文明交流互鉴自然打上了患难与共的历史烙印。

从19世纪下半期开始，中国和印度两大文明古国的人民斗争就开始遥相呼应。国内外学者普遍认为，在“亚洲革命风暴”中，中印两国人民的斗争“起了明显的客观上相互支持的作用”。具体说来，1857~1859年的印度民族大起义在一定程度上牵制了英国殖民者对1851~1864年中国太平天国运动的干涉，使得“英国在中国扩大侵略战争的计划，只好推迟到第二年才进行”，同时中国人民的反抗斗争也“牵制了英军的大批兵力”，“使英印当局更多更快地集中兵力镇压起义的计划无法实现，对大起义也是一种无形的支援”。^①由此可见，中印两国的起义和革命运动具有了初步的国际意义，虽然最终都失败了，但却打击了英国殖民者和当地封建势力，表现了两国人民不畏强权、要求改变现状的共同决心和勇气。

除了民族解放运动客观上的相互支持，中国人民与南亚人民尤其是中印两国知识分子和精英阶层在主观上也相互同情、互为声援。19世纪80年代之后，中国资产阶级维新派开始创办自己的报刊，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在《万国公报》《中外纪闻》《强学报》等报刊上发表了大量涉及印度的文章，据统计“康有为著作中讲到印度的约有80篇200处，梁启超有近100篇200多处”^②，此外康有为在旅居印度时还写有《印度游记》及其他著作。在这些文章和著作中，康梁等人既有关于印度沦为英国殖民地原因的论述，也有对英国高压统治的抨击，更有不少对“饱尝殖民地苦味的印度人民”的同情。^③

资产阶级改良派失败后，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走上了政治舞台。在《民报》等革命刊物上，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大量发表和转载反映印度人民反英斗争的文章，不仅使得“印度革命派的观点‘暴著海内’，在东亚、东南亚广为传播，获得了亚洲被压迫民族的普遍同情和支援”，而且也用生动的方式

^① 林承节：《中印人民友好关系史（1851~1949）》，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46~47页。

^② 同上，第56~57页。

^③ 同上，第57~74页。

对中国人民进行了革命教育，“开阔了中国人民的眼界，使他们从印度民族运动中吸去了有益的经验教训，得到有益的借鉴。”^①更为重要的是，在相互声援的过程中，章太炎在1906年率先提出了亚洲被压迫民族相互支持和中印联合的思想。此后不久，孙中山也提出了类似思想，主张以中国和印度为中坚力量实现被压迫民族的大联合、大团结。大体在同一时期，当中国出现革命浪潮和清政府宣布实行“新政”的消息传至印度之后，印度民族主义者也倍感欢欣鼓舞，国大党极端派领导人之一奥若宾多·高士赞誉“中国的进步”，印度圣雄甘地感叹“中国的觉醒”，绝大多数印度民族运动的领袖都坚信民主共和原则在中国必胜，给予中国的民族革命运动极大的精神鼓舞。^②

如果说20世纪20年代以前，中国与南亚的文明交流互鉴主要是集中在政治方面的话，那么1924年的泰戈尔访华则使得近代中印友谊在以反帝斗争合作为主的同时，拥有了文化交往这个强劲侧翼。^③实际上，早在1913年泰戈尔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中国文坛就兴起了一股“泰戈尔热”，积极宣介研究泰戈尔的作品和思想。1924年，泰戈尔访问中国近50天，在上海、北京等7个城市发表大量演讲，与梁启超、胡适、熊希龄、徐志摩、梁漱溟、梅兰芳、齐白石等中国社会各界名流广泛交流，还在64岁生日当天得到了梁启超送的中国名字“竺震旦”。总体上看，泰戈尔访华“在中印文化交流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特殊价值”，不仅重新恢复了清末之后受殖民主义干扰而几乎中断的中印文化交流，而且在谭云山等中国学者的鼎力支持下，“促成了中印学会和中国学院的创建，为两国学者的文化交流提供了固定的场所”。^④此外，泰戈尔访华“还开创了以两国语言直接交流为特点的印度中国学研究之路，推进了古代与近代研究并重的中国印度学研究的发展”。由此，中印两大文明的交流互鉴突破了宗教层面的局限，交往互动的领域和深度日益拓展。^⑤

到了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印度国大党派出了著名的“印度援华医疗队”，5位大夫均由尼赫鲁亲自选定。1938年9月，印度援华医疗队到达中国广州。次月，医疗队到达重庆，在遇到谭云山时表示想要取中文名字。谭云山欣然应允，在5位印度大夫的姓氏后均加一“华”字，分别取名为爱德华、卓克华、木克

① 陶绪、樊英：《中国近代资产阶级革命派与亚洲民族的觉醒》，《益阳师专学报》，1996年第1期，第80~81页。

② 林承节：《中印人民友好关系史（1851~1949）》，第76页。

③ 同上。

④ 艾丹：《1924年泰戈尔访华对中印文化交流的而影响》，《中国校外教育》，2011年第14期，第30~31页。

⑤ 同上，第30~31页。

华、巴苏华、柯棣华，以表医疗队成员热爱中国之意。其中，柯棣华于1941年与白求恩卫生学校教员郭庆兰结婚，被当地乡亲称为“中国女婿”，次年6月柯棣华加入中国共产党。1942年12月9日，年仅32岁的柯棣华不幸病逝，毛泽东主席在挽词中动情地说：“全军失一臂助，民族失一友人。柯棣华大夫的国际主义精神，是我们永远不应该忘记的。”^①1943年，巴苏华返印后，印度医疗队的援华使命宣告结束，但医疗队的事迹却在中印两国传播开来。正如印度驻华大使拉奥琪所说，印度国大党派出医疗队援助中国，“是印度与中国这两个亚洲伟大的文明古国之间友好与理解的象征，表达了印度人民愿与中国人民休戚与共的决心。”^②

相较于与南亚的交往，中国与东南亚在近现代时期的交流互鉴也不乏亮点，特别是华侨华人在其中发挥了独特的作用。明代以后，受封建王朝海禁政策和闭关锁国的影响，中国与东南亚各国的交流陷入低谷，但政府间的使节往来依然延续。鸦片战争之后，大量中国人因避战、逃难而移民东南亚，逐渐形成了遍及东南亚各国的华侨社会，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华侨社会又演变成了华人社会，逐渐融入当地社会之中”^③。随着华侨华人社会的形成和发展，中国与东南亚的文明交流互鉴也不断走向深入。一方面，中国向东南亚输入的商品种类从传统的奢侈品扩展至家具、成衣、笔墨纸砚等日常生活用品，同时中国的民间信仰也随着人口的流动传播至东南亚，不仅“使东南亚的地区服饰、饮食和礼仪方面发生了一些变化”，而且加深了东南亚宗教文化的多元化特征；另一方面，东南亚的番薯、玉米、烟草等经济作物和粮食作物被引入中国，华侨华人的资金和技术也向中国侨乡回流，明显改善和促进了当地的经济社会发展。^④进入20世纪，华侨华人在海外为中国的抗日战争提供了有力支持，其中最为典型的当属南洋华侨机工队。1939年2月，南侨总会召集三千余名来自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的华侨青年，组成“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服务队”，积极承担了滇缅公路沿线运送军需物资、维修运输车辆等任务，以一千余名华侨机工的牺牲为代价，给予中国人民的全面抗战有力支持。对此，有学者评价称，“正是因为南洋机工的努力及高效的运输确保了中国战场所需的军事物资及时得到补给，从而使相持阶段的战争得以

① 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中国印度友好协会、中国南亚学会编：《中印友谊史上的丰碑——纪念印度援华医疗队》，世界知识出版社2008年版，第38页。

② 同上，第11页。

③ 陆芸：《中国与东南亚关系的历史回顾与展望》，耿昇等主编：《多元视野中的中外关系史研究——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第六届会员代表大会论文集》，延边大学出版社2007年4月版，第31页。

④ 同上，第31~32页。

持续。”^①

回顾中国与南亚东南亚文明交流互鉴的近现代历史，既有遭受殖民主义侵略压迫的共同记忆，也有为争取民族解放和实现国家独立的共同抗争，在屈辱史和抗争史交织前行的历史进程中，中国与南亚东南亚各国人民相互同情、相互支持、相互声援，丰富了世界历史上文明交流互鉴的深刻内涵，谱写了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不同文明之间在特定历史时期休戚相关、患难与共的感人篇章。

（三）当代：命运相连、求同存异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中国与南亚东南亚国家陆续赢得独立，以坚定的步伐踏上了谋求经济发展、改变落后面貌的新征程，努力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逐步赶上了时代发展潮流。虽然现实国情不尽相同、发展道路各有千秋，中国与南亚东南亚各国之间也曾出现过矛盾、冲突乃至战争，但早在各国独立前就已经存在的国际主义和区域联合理念却依然具有强大生命力，不断突破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异而历久弥新。总体上看，自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以来，中国与南亚东南亚的文明交流互鉴体现了命运相连、求同存异的历史大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与南亚东南亚国家进一步在反对帝国主义的旗帜下互相声援、密切合作，新生的人民政权与南亚东南亚多国快速走向蜜月期。在南亚，印度在当时两大阵营对立的情况下，拒绝英美的拉拢，迅速做出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决定，成为第一个与新中国建交的非社会主义国家，此后又在朝鲜问题、印度支那问题、中国恢复联合国席位等重大国际问题上与中国密切配合，给予了我国新生的人民政权有力的支持。中国则投桃报李，在1951年印度因灾荒缺粮时，同印度签订麻、米换货协定，在自己粮食远非富裕的情况下，以5万吨大米换取印度1.65万包麻的方式，向印度慷慨供粮。^②在1954年关于印度支那问题的日内瓦会议中，中国也有意提高印度的地位和作用，力促印度成为《日内瓦会议最后宣言》国际监督监察委员会的主席。同时，中国还大力支持印度收回果阿的斗争，先是在1955年8月23日在北京召开了由中印友好协会发起，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中华全国总工会、全国妇联、文联等各界人士五千多人参加的支援印度人民收复果阿大会，后又于1961年12月19日公开发表声明，坚决支持印度政府收复果阿的行动，“为印度人民剔除殖民主义在其祖国最后的一个据点而欢欣鼓舞”。^③正是由于在上述重大问题上的相互支持和密切配合，中印

^① 夏玉清：《试论抗战时期南洋华侨民工对军事物资补给的贡献》，《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15年第3期，第13页。

^② 赵蔚文：《印中关系风云录（1949~1999）》，时事出版社2000年版，第35页。

^③ 同上，第60页。

两大文明古国在各自独立后不久，便迎来了“印地—秦尼巴伊巴伊”的关系蜜月期。

在东南亚，中国大力支持东南亚各国人民的革命和斗争运动，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对越南的大力援助。1950年1月，应越共中央和胡志明主席的要求，中国不顾建国之初的重重困难，依然作出全面援越的重大决策，在此后数年间不仅派出了军事顾问团和政治顾问团入越支援，而且在广西创办桂林育才学校和南宁育才学校，接纳越南师范学校和中小学师生员工，为越南普通教育开辟了后方基地。1954年，越南抗法斗争胜利后，中国延续全面援越方针，“将大力援助越南经济建设确定为外交工作的一项中心任务”，派出专家和技术人员，帮助越南修复基础设施，新建企业，恢复工业生产。据统计，1955~1961年间，中国为越南提供无偿援助共计9亿旧卢布，占社会主义国家对越无偿援助的62%；援越长期贷款9.3亿，占42.5%。到了60年代，中国积极支援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国战争，仅军事方面就“先后派出防空、工程、铁道、后勤、扫雷等支援部队共32万多人赴越”，同时还提供了包括物资输送、成套项目、现金汇款、专家指导、人员培训等多种形式的实质性援助，这种“真诚、及时、积极有效”行为换来的是中越两国在长达28年的时间里“同志加兄弟”般的亲密关系。^①

当然，除了双边交流之外，中国与南亚东南亚国家在国际舞台上的多边合作也是彼此之间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内容，其中最具代表意义的无疑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提出和万隆会议的胜利召开。1953年12月，中国总理周恩来在会见印度代表团时首次提出了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惠、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后来这五项原则在措辞上作了修改，改为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1954年6月，周恩来总理在赴印度和缅甸访问期间，中国与印度、缅甸进一步深化共识，共同向世界各国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1955年4月18日至24日，“第一次亚非会议”在印尼万隆胜利召开，来自29个亚非国家和地区的政府代表首次在没有西方国家参与的情况下自主召开国际会议，探讨彼此的前途和命运，共同抵制新老殖民主义，通过了《关于促进世界和平与合作的宣言》。作为亚非人民团结合作的重要里程碑，同时也是中国与南亚东南亚文明互鉴的标志性事件，万隆会议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提出了处理国家间关系的十项原则，“为推动国际关系朝着正确方向发展，为推动亚非合作、南南合作，为促进南北合作，发挥了重大历史性作用”，并且“形成了团结、友谊、合作的万隆精神，促进了亚非拉民族解放

^① 有关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至70年代中期我国对越援助的基本事实，可参见张勉励：《中国援越历史回溯》，《世界知识》，2011年第13期，第18~21页。

运动，加速了全球殖民体系瓦解的历史进程”。^①此外，在万隆会议期间，以周恩来总理为首的中国代表团抓住有利契机，在会场内外广交朋友、增进共识，既为平息各国争论和使会议重回正确轨道做出了突出贡献，更加使得求同存异的思想主张深入人心，为会后中国与南亚东南亚等地区发展中国家跨越不同意识形态和不同国家制度，深入开展不同文明之间交流对话和互学互鉴，奠定了坚实基础。^②可以说，正是由于秉持求同存异的重要理念，中国与南亚东南亚文明交流互鉴的路子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越走越宽，展现出了新的面貌，早已突破了区域的局限而越来越具有全球和战略意义。

当前，世界历史的发展走到了十字路口，全球局势正在发生复杂且深刻的历史性转变。但是，中国与南亚东南亚各国命运与共、心手相连的基本事实没有变，仍然拥有共同的发展目标，都致力于促进经济健康发展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都需要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和亲诚惠容的周边环境，都希望加强彼此之间的睦邻友好和务实合作，因此求同存异、互学互鉴仍是中国与南亚东南亚文明交流互鉴的主旋律。

二、中国与南亚东南亚文明交流互鉴的历史特点和历史启示

中国与南亚东南亚文明交流互鉴的历史，既是一部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的历史，也是一部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的历史，还是一部以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的历史。在数千年来的时间长河中，中国与南亚东南亚的文明交流互鉴呈现出了不少鲜明的历史特点，对我们今天推动构建中国—南亚东南亚命运共同体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一）中国与南亚东南亚文明交流互鉴的历史特点

1. 源远流长，历久弥新

毋庸置疑，中国与南亚东南亚的文明交流互鉴源远流长。“源远”指的是中国与南亚东南亚的文明交流互鉴在很早就已经开始，早在两汉时期，中国就与南亚东南亚地区有了人员上的往来，并在诸如《史记》等史籍中有着明确记载。

“流长”是说中国与南亚东南亚的文明交流互鉴绵延至今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彼此交往过程中虽然也有曲折反复，有时高潮迭起，有时暂落低谷，但总体上从未断绝，呈持续发展态势。

^① 习近平：《弘扬万隆精神 推进合作共赢——在亚非领导人会议上的讲话》，《中国青年报》，2015年4月23日，第2版。

^② 陈长伟、牛大勇：《中国开创亚非外交新局面的成功范例——万隆会议再探讨》，《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18年第4期，第86~88页。

进一步而言，中国与南亚东南亚的文明交流互鉴是随着交通通道的不断开辟而同时进行的。反过来说，彼此之间交通通道的不断开辟、不断增多构成了中国与南亚东南亚文明交流互鉴不断拓展、不断深化的重要条件。以中国云南和周边毗邻地区的交往为例，历史上最早的往来通道仅限于由永昌道出境，走上缅甸至印度阿萨姆的陆上交通，后来又有在东汉时期开通，从永昌郡顺伊洛瓦底江至夫甘都卢国，然后顺水至谶离国，再入海航行至黄支国和已程不国的海路。唐宋时期，随着南诏、大理两国地方民族政权的兴起，云南的对外交通不断扩展，不仅形成了南诏通天竺道的三条路线，而且还存在着若干民间小道，可由西蜀经吐蕃到达天竺。元明清时期，云南与印度的交通继续发展，一方面南方丝绸之路的通道更多，“由滇入缅的通道从滇西到滇西南变为多条多向”，另一方面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性趋于上升，“由滇南经红河水道至今越南，联通海上的交通线已经发展成一条成熟的商道，并成为云南与印度间通道之一”。^①到了抗日战争期间，祖国西南大后方的出海通道被切断，我国军民沿南方丝绸之路西南道的大体走向修筑了由昆明至瑞丽、畹町再至缅甸的滇缅公路，与美国合作修建了自印度雷多经缅甸密支那至中国昆明的“史迪威公路”，与盟军开辟了西起印度阿萨姆邦，向东横跨喜马拉雅山脉、高黎贡山、横断山、萨尔温江、怒江、澜沧江、金沙江、丽江白沙机场，进入中国的云南高原和四川省的“驼峰航线”。在抗日战争的烽火中，上述陆路和空中运输空前繁忙，打通了中国与外部世界联系的重要运输通道，成为了后方支援抗战的重要生命线。可以说，历史上中国与南亚东南亚之间每一条重要交通通道的成功开通，都推动了彼此之间文明交流互鉴在更大空间、更广范围内的开展，因此源远流长的互学互鉴与多条多向的互联互通实为中国与南亚东南亚文明交流互鉴的一体两面。

2. 官民并举，民间先行

自古以来，中国与南亚东南亚文明交流互鉴的途径与方式多种多样，但主要可归为官方和民间两大类，且始终维系着官方交往与民间交流的并行发展，体现出官民并举、民间先行的鲜明地域特色。

在古代，中国与南亚东南亚各国的使臣互访络绎不绝、无以数计。以中国与南亚的使臣互访为例，自汉武帝派张骞两次出使西域之后，我国与南亚地区的交往在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日趋频繁，除了天竺以外，还发展了与狮子国（今斯里兰卡）的关系。有唐一代，我国与天竺、狮子国的关系继续发展，李义表、王玄策先后数次出使天竺，加设路国、摩揭陀国、那揭国、泥婆罗国等均遣使来朝，

^① 关于古代中国云南与印度的交通通道，可参见任佳、牛鸿斌、周智生：《中国云南与印度历史现状和未来》，云南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3~9 页。

吐蕃与泥婆罗之间还发展出了吐蕃王弃宗弄赞娶泥婆罗公主赤贞为王后的联姻关系。辽宋金元时期，辽国与狮子国关系友好，北宋真宗至神宗时期与南印度注辇国使臣互访频繁，元朝世祖和仁宗在位时与马八儿、俱兰国都有使臣往来。明朝时期，我国与榜葛拉（今孟加拉地区）多次遣使互访，榜葛拉国王还两次送来麒麟（长颈鹿）。同时，明朝还与溜山（今马尔代夫）、锡兰（今斯里兰卡）等印度洋国家关系亲厚，永乐年间出现了数次使臣互访。郑和下西洋后，明朝与南亚诸国的关系更加密切。^①从上述史实中不难发现，历史上中国与南亚国家官方之间的交往十分频繁，而中国与东南亚的官方交往也是如此。

在官方交往连绵不绝的同时，中国与南亚东南亚的民间交流更加频繁，形式更加多样。例如，古代印度来华弘法和中国赴印求法的诸多高僧，基本上都得到了封建王权的大力支持，其中今天为人耳熟能详的迦湿弥罗、竺法护、佛图澄、菩提达摩、指空等印度高僧，以及法显、玄奘、义净等中国高僧，要么是直接受到王朝的派遣，要么是在旅途期间得到官方的保护，故而方能顺利成行。^②中国学者耿引曾指出，“使臣的互访为国家间的友好相处奠定了基础，而延续千年的僧侣交往则产生了更加深远的影响”。^③正是这些前赴后继的高僧，不仅留下了今天我们研究古代南亚东南亚的珍贵文献，他们还成为了中国与南亚东南亚各国交流互鉴的先行者和探路人，带动了彼此官方交往的加强与深化，促进了彼此在思想文化上的交光互影。

中国与南亚东南亚的文明交流互鉴在历史上是官民并举、民间先行，在当代也延续着这样的态势。例如，20世纪90年代末，云南省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南亚研究中心）利用与印方高级智库和智库负责人保持密切联系的优势，促成1998年印方政府智囊高级别代表团赴滇访问并与云南省政府会谈，开启了滇印地方合作的先河。同年11月，第一次中印地区合作论坛在印度召开，云南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省社科院派出代表团访印，促进滇印地方合作走向深入。此间，云南学者率先提出了中印缅孟地区经济合作的构想，并得到了印缅孟三国学术界的积极回应。1999年8月15日，首届中印缅孟地区经济合作与发展会议在中国昆明举行，与会四方代表签署了《昆明倡议》，标志着孟中印缅合作机制的建立。自此，四国智库在二轨层面进行了十余年的研讨共商，探讨了互联互通、贸易与

^① 关于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17世纪上半叶中国与南亚的使臣互访问题，可参见耿引曾：《中国与南亚的友好关系源远流长》，《南亚研究》，1982年第2期，第15~16页。

^② 关于古代中印之间的僧侣往来，可参见谭中、耿引曾：《印度与中国：两大文明的交往和激荡》第五章“高僧一览”，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254~296页。

^③ 耿引曾：《中国与南亚的友好关系源远流长》，《南亚研究》，1982年第2期，第17页。

投资、旅游文化、社会发展和合作机制建设等重要议题，共同提出了昆明—曼德勒—达卡—加尔各答经济走廊构想，先后发表了《昆明倡议》《达卡声明》《仰光声明》《昆明声明》《德里声明》《内比都声明》等重要文件。2013年，“孟中印缅经济走廊”被写进中印两国发表的《中印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未来发展愿景的联合声明》，正式上升为中印两国政府的共识，也得到孟加拉国和缅甸两国政府的支持。2015年，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又被写进了中国发布的《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成为了“一带一路”倡议框架下的六大经济走廊之一。2013、2014、2017年，在中孟印三国分别召开了三次孟中印缅经济走廊联合工作组工作会议，标志着孟中印缅地区合作从理论构想变为政府决策。应该说，这是中国与南亚东南亚文明交流互鉴的当代重要成果，也是民间交流先行一步，从而推动政府间务实合作的典型例证。

3. 取长补短，择善而从

中国与南亚东南亚各国毗邻而居，彼此之间的文明交流互鉴一直保持着相互影响、取长补短的传统，这种传统体现在彼此政治、经济、科技、文化、宗教、习俗等各个领域。限于篇幅，这里以中国与东南亚之间的文明交流互鉴互例，做一些说明。

一方面，中国文化对东南亚产生了广泛且深远的影响。政治上，东南亚在历史上受中国封建王朝的影响很大，特别是越南在古代长期受中国封建王朝的直接统治，行政施治与中国内地区别不大，故而中国的行政体系和典章制度对越南影响深远，使得越南在独立后很长一段时期继续参照我国的政策模式治理国家。经济上，中国与东南亚各国的关系首先是通过贸易往来逐步建立的，历史上中国从东南亚购买大量当地土特产，丰富了自身的物资供应，同时向东南亚各国运销丝绸、瓷器、金银器等商品，对当地生产条件的改善以及生活方式的变迁，起了重要推动作用。同时，古代中国的货币在东南亚地区的广为使用，使得东南亚一些国家货币的产生和发展受到我国币制的很大影响。科技上，古代中国的生产力水平遥遥领先东南亚地区，科学技术高度发达，无论是农业方面的水稻种植、蚕桑丝织、制糖酿酒等技术，或是建筑方面的烧砖制瓦、城市布局、造型设计等技艺，还是科技方面的天文历法、造纸印刷、数学珠算等知识，都被东南亚各国广泛吸收。在文化上，中国的语言文字对东南亚文化的影响更为深远，不仅东南亚各国的语言中有着大量的汉语借词，越南更是在13世纪时仿效汉字创造了“字喃”，而且中国的许多文学作品、音乐舞蹈、生活习俗也随着人口的流动传入东南亚国家，使得象征着中国先进文化的冠带服饰、烹饪饮食、家庭观念等受到东南亚人民的欢迎和接纳。

另一方面，在文明交往双向流动的过程中，中国也在很多方面吸收了东南亚文明的一些因素。农业方面，烟草、番薯、玉米、棉花、南瓜、槟榔、荔枝、龙眼、菠萝蜜、椰子等农作物就是从东南亚先后传入或引进中国的。工艺方面，东南亚苏门答腊、槟榔屿等地出产的苏泥、勃青、紫啡、胭脂石等材料使中国陶瓷品种日益多样化。语言文字方面，中国历代王朝的担任各国使团翻译的“通事”，不少是招募懂汉语的东南亚人，明朝期间为培养翻译人才，还在北京设置“四夷馆”，在云南设立“缅字馆”，使得东南亚国家语言中的一些词汇融入了汉语，尤其是闽南语和客家话中有了不少马来语、印尼语等东南亚语言的借词。宗教方面，云南等我国西南地区历史上一度盛行的佛教密宗，就是印度传入下缅甸后，在公元7世纪沿伊洛瓦底江河谷传入大理地区的，对南诏、大理的文化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此外，云南德宏、西双版纳等地的小乘佛教也是从缅甸传入，至今仍是当地少数民族的重要信仰。

上述事实表明，在中国文明因素向外传播的同时，中国也在与周边地区进行文明交流互鉴的过程中获得并吸取了有益于自身文明发展的许多东西。中国与南亚东南亚文明交流互鉴的实质，很大程度上就是彼此之间的取长补短、择善而从。

（二）文明交流互鉴对推动构建中国—南亚东南亚命运共同体的启示意义

像中国与南亚东南亚文明交流互鉴这样绵延至今超过两千年的友好关系，在世界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对于推动构建中国—南亚东南亚命运共同体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1. 文缘相融是推动构建中国—南亚东南亚命运共同体的先天优势

中国与南亚东南亚地缘相近，在文明交流互鉴的长期历史过程中，形成了文缘相融的紧密联系。通过上文的论述不难发现，这种紧密联系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彼此之间的交流互动源远流长且从未中断，使得中国文明与南亚文明、东南亚文明在各自发展的同时，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亲缘关系；二是官方交往和民间交流并行不悖，使得中国文明与南亚文明、东南亚文明是在相互交融、互学互鉴的过程中得以发展的，形成了交往方式十分多样、互动领域十分广阔、交流内涵十分丰富的历史格局；三是相近的文化成果和相似的文化现象拉近了中国与南亚东南亚各国彼此之间的距离，使得中国文明与南亚文明、东南亚文明的交流互鉴长期保持了内容不断丰富，领域不断拓展，影响不断扩大的发展态势。以上三个方面的紧密联系成为推动构建中国—南亚东南亚命运共同体的先天优势，有利于中国与南亚东南亚各国彼此之间相互包容，通过有效沟通和深入对话，化解误解与分歧，突破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不同制度的隔阂与差异。

2.文化认同是推动构建中国—南亚东南亚命运共同体的关键所在

中国与南亚东南亚的文明交流互鉴绵延至今两千余年从未间断，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在文化上形成了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格局，换言之就是文化认同的程度较高，使得比邻共生的不同文明有了文化共鸣的牢固纽带。当下，中国与南亚东南亚的经贸关系虽然不断加强，但南亚东南亚的一些国家却出现了对我“近而不亲”的现象，对中国的认可度普遍偏低，对中国的认识预期较为消极，且有的国家“政府与民间层面的对华态度还相对分离，即政府高层对华友好，而民间则对华不友好甚至反感”。^①究其原因，文化认同的错位乃至缺失不容忽视。正如我国学者李向阳所说：“导致亚洲经济一体化进程失衡的一个很重要原因就是亚洲国家尤其是亚洲大国，在非经济领域缺少信任，而这种信任并不是单一的经济因素或者经济手段能够解决的。”^②的确，从历史上看，经济上的互利只是短暂的，而文化上的认同才是长久的。因此，推动构建中国—南亚东南亚命运共同体应将文化认同视为关键所在，高度重视文化层面的交流互动，加强增信释疑，凝聚更多认同，培育共同价值。

3.文明对话是推动构建中国—南亚东南亚命运共同体的必由之路

历史上，中国与南亚东南亚各国之所以能够长期保持总体和平友好的关系，文明对话的作用不容忽视。在开展文明对话的过程中，中国与南亚东南亚各国形成了求同存异的重要传统，使比邻而居的不同文明得以和谐相处。一方面是“求同”，重视在相互交融、互学互鉴的过程中不断扩大不同文明之间的共同性，让彼此之间的关系更加亲近友善。另一方面是“存异”，强调在相互尊重、各自发展的过程中正确看待不同文明之间的差异性，让彼此之间的关系更加和谐宽容。因此，秉持求同存异的优良传统，增进文明对话是推动构建中国—南亚东南亚命运共同体的必由之路。至于如何走好这条路，习近平主席已经为文明相处之道贡献了“中国方案”：一是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二是坚持美人之美、美美与共；三是坚持开放包容、互学互鉴；四是坚持与时俱进、创新发展。^③

^① 王秋彬：《周边国家对华“近而不亲”：困境、原因及其化解路径》，《当代世界》，2017年第3期，第13页。

^② 《专访：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助推亚洲经济一体化——访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院长李向阳》，新华丝路网，2019年5月16日，<https://www.imsilkroad.com/news/p/372905.html>。

^③ 习近平：《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求是网，2019年5月1日，http://www.qstheory.cn/dukan/qs/2019-05/01/c_1124440781.htm。

三、以文明交流互鉴推动构建中国—南亚东南亚命运共同体的几点思考

在全球化时代，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独自发展。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不仅是国际社会的普遍期待，也是中国推进全球治理改革、解答时代命题的重要主张。习近平主席指出，“应对共同挑战，迈向美好未来，既需要经济科技力量，也需要文化文明力量”。^①推动构建中国—南亚东南亚命运共同体同样如此，也需要不断为之注入文化因子、汇聚文明力量，在继续以“一带一路”建设为实践平台加强经济合作的同时，更要促进文明交流互鉴走深走实、行稳致远。

（一）大力弘扬丝路精神，深刻阐释构建中国—南亚东南亚命运共同体的精神内涵

要大力弘扬“团结互信、平等互利、包容互鉴、合作共赢，不同种族、不同信仰、不同文化背景的国家可以共享和平、共同发展”的丝路精神，树立“包容、平等、尊重、借鉴”四大理念，依托“一带一路”建设重要实践平台，倡导文明宽容，坚持求同存异，尊重南亚东南亚国家的道路选择，以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和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廊沿线为重点推进路线，大力构建中国与南亚东南亚的全方位互联互通伙伴关系，尊重南亚东南亚国家参与国际区域合作和经济走廊建设的现实诉求，“多栽花”“少栽刺”，将“一带一路”真正建设成为文缘相融之路、文化认同之路、文明对话之路，促进中国文明、南亚文明和东南亚文明之间的当代交流互鉴。

与此同时，还要善于运用恰当的国际交流话语体系，积极宣传文明对话的指导思想与合作理念，尤其是在对外宣传工作中，要慎用容易引起外界疑虑和反感的词汇，尽量避免使用“西进”“东出”“南下”等词汇来描述我国对外人文交流合作的方针政策。

（二）大力挖掘历史资源，充分调动构建中国—南亚东南亚命运共同体的文化基因

要高度重视文明对现实世界的推动作用，深刻把握文明与发展之间的内在逻辑，大力挖掘中国与南亚东南亚悠久历史交往、长期和平友好的丰富历史文化资源，充分调动中国与南亚东南亚命运共同体建设的文化基因。

一方面，要从多民族迁徙交融、人口多向流动的角度，充分挖掘中国与南亚东南亚各民族的共同历史记忆，增进彼此之间的相互认同。另一方面，也要

^① 习近平：《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求是网，2019年5月1日，http://www.qstheory.cn/dukan/qs/2019-05/01/c_1124440781.htm。

从多元文化传播交流、多样文明借鉴交融的角度，充分挖掘中国与南亚东南亚各国文明抵制固步自封、走向开放包容的共同历史经验，促进彼此之间的增信释疑。

要从历史和文化的视角，深刻揭示构建命运共同体是中国与南亚东南亚国家共同的必然选择，从而不断强化中国与南亚东南亚携手构建命运共同体的前进动力。

（三）大力开展人文交流，不断夯实构建中国—南亚东南亚命运共同体的人文基础

要把人文交流合作作为推动构建中国与南亚东南亚命运共同体的优先领域，以人文先行促进民心相通，围绕健全机制、搭建平台、抓实项目、打造品牌四个关键，促进中国与南亚东南亚在文化、科技、教育、旅游、智库、媒体等领域全方位、高层次、多渠道的人文交流合作走深走实，为推动构建中国—南亚东南亚命运共同体夯实人文基础。

在文化合作领域，一是要健全完善中国与南亚东南亚国家文化参赞联席会议、文化主管单位对等互访、文化机构年度合作、文化行政部门定期联络等机制建设，推动签署一系列双边、多边人文交流合作备忘录。二是要借助中国—南亚博览会、中国—东盟博览会等综合性国际合作平台，积极搭建中国与南亚东南亚文化交流合作的专门平台，同时争取在南亚东南亚国家建立更多类似于柬埔寨金边中国文化中心的驻外文化交流机构。三是要聚焦现实可行性和项目带动性，研究策划中国与南亚东南亚国家图书馆博物馆艺术馆国际合作计划、毗邻地区文化遗产保护合作计划、边境地区民间文艺交流计划等，形成一批彰显地域共同特色、反映历史共同记忆、回应民众共同诉求的文化合作重点项目。四是要充分激发中国与南亚东南亚国家毗邻地区相关省邦的地方活力，借鉴和推广“文化中国·七彩云南”“七彩云南·周边行”“中国—南亚东南亚文化多样性云南论坛”等现行文化交流机制的成功经验，努力打造一批面向南亚东南亚的文化交流合作高端品牌。五是要以文艺为优先领域，积极利用现有资源，努力开拓新的渠道，以中国与南亚东南亚毗邻地区的主要节点城市为依托，以泛亚公路网等交通干道为交流路线，将文艺交流融入互联互通建设，鼓励各类文艺团体充分发挥交流主体作用，推动区域间、城市间、市民间多种多样的文艺交流，探索建立中国与南亚东南亚区域文艺合作联盟机制，以文艺交流传播文明对话的正能量。

在科技合作领域，要从政府间合作和民间合作两个层面，努力提升科技合作的层次和水平。一方面，要进一步加强政府间合作，通过建立跨部门的国际科技合作联席会议制度等方式，大力发展区域科技合作中介服务机构，实现合作方式

的多元化和各类合作主体的优势互补，努力提升中国与南亚东南亚科技合作的层次和水平。另一方面，要积极鼓励国内高校、科学院、企业研究所等各类科研机构开展与面向南亚东南亚的科技合作，尤其是要培养企业研究所成为中国与南亚东南亚开展科技合作的生力军，并力争形成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和研究开发能力的核心技术和关键技术。具体到科技合作项目方面，应积极推进交通运输、基础设施建设、农业、矿业等重点领域的合作，同时兼顾贸易信息、通讯信息等基础性领域的合作。

在教育合作领域，要更新合作理念、创新合作模式，加强对南亚东南亚国家各层次教育的理念和体系的了解把握，鼓励和推动中国与南亚东南亚之间尤其是彼此毗邻地区之间多边、双边教育产业的人员往来，共同开发适合彼此的教育项目和教育产品，扩充中国与南亚东南亚各国教育合作的内涵和空间，最终实现彼此之间全方位的教育合作。

在旅游合作领域，要按照“政府搭台、企业唱戏”的市场化运作模式，以交通便利化的不断升级带动中国与南亚东南亚各国旅游产业的深度合作，在挖掘历史资源的基础上，着力开发民族风情游、寻根访祖游、宗教文化游、节庆出境游等主题旅游市场，开拓更多旅游路线，开发更多周边产品，推动相关产业发展。

在智库合作领域，要充分汲取孟中印缅四国智库间过去合作的成功经验，通过建立智库联席会议、智库机构和智库学者互访、年度项目合作等机制，推动中国与南亚东南亚智库间交流合作形成更多新的平台，以及更多符合各方需求、体现区域特色的智库交流合作项目，为中国与南亚东南亚的文明交流互鉴注入新的时代内涵。

在媒体合作领域，要大力倡导国内主流媒体积极“走出去”，主动加强与南亚东南亚各国媒体的交流合作，通过策划专题、联合报道、设立专版等多种方式，为构建中国—南亚东南亚命运共同体营造良好的舆论环境。同时，还要着力加强中国与南亚东南亚各国媒体的信息共享，加大从业人员交换、媒体技术交流、新闻产品互换等多种形式合作的力度，帮助各国民众增进对彼此的理解，以信息互通促进民心相通。

（四）大力推动“南丝”申遗，积极推进构建中国—南亚东南亚命运共同体的项目合作

要大力推动与印度、尼泊尔、缅甸等国在南方丝绸之路联合申遗方面的务实合作，启动前期工作，建立工作机制，为构建中国—南亚东南亚命运共同体奠定项目合作的坚实基础。

一是要充分借鉴中国和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联合申报的“长安—天山

廊道”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目录的成功经验，加强与印度、尼泊尔、缅甸等国的协调配合，启动以“南方丝绸之路廊道”为名联合申请世界文化遗产的行动，尽快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中心进行备案。

二是要将南方丝绸之路联合申遗纳入孟中印缅合作范畴，建立多国联合学术研究平台以及南方丝绸之路学术高峰论坛机制，以历史遗址勘察、文物保护规划编制、沿线环境整治等方面为重点，积极开展南方丝绸之路联合申遗的相关前期工作。^①

三是要与印度、尼泊尔、缅甸等国协商一致，建立南方丝绸之路联合申遗工作联席会议机制，组建“南方丝绸之路廊道联合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工作组”，负责联合申遗的组织、协调、联络、宣传等工作。

四是要正视南方丝绸之路联合申遗仍存在的基础工作较为薄弱、相关研究不够充分、遗产价值提炼不够清晰、遗产本体及周边环境保护亟待改善等问题，加强与印度、尼泊尔、缅甸等国在各遗址点文物本体保护修缮、环境整治、阐释展示等方面的交流合作，科学且专业地推进多国联合申遗进程。

结语

南亚东南亚既是中国重要的周边地区，也是发展中国家相对集中的地区。回顾历史，中国与南亚东南亚的文明交流互鉴可谓是“志之所趋，无远弗届；穷山距海，不能限也”。反思当下，中国与南亚东南亚的文明交流互鉴恰好比“乘风破浪头立，扬帆起航正当时”。展望未来，中国与南亚东南亚的文明交流互鉴必定会“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故此，中国应携手南亚东南亚国家，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方面先行一步，汇聚各自文明力量，秉承各自文明传统，发挥各自文明优势，率先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与命运共同体。

[责任编辑：孙喜勤]

^① 关于将南方丝绸之路联合申遗纳入孟中印缅合作范畴的问题，云南学者已提出相关建议，详情可参见《云南学者：南方丝路申遗可纳入孟中印缅合作范畴》，人民网，2013年11月13日，<http://culture.people.com.cn/n/2013/1113/c172318-23529530.html>。